

□刘墨

朱寿昌

朱寿昌，字康叔，是流传甚广的“二十四孝”故事中的一位主角。其父朱巽是仁宗年间的工部侍郎，母刘氏是朱巽之妾。在朱寿昌幼时，刘氏就被朱巽遗弃，母子从此分离五十年。

长大之后的朱寿昌仕途颇为顺利，先后做过陕州、荆南、河中府通判，岳州、夔州、鄂州知州，广德知军，又任司农寺少卿、朝议大夫等。

因“乌台诗案”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的苏轼，正处于艰难穷困之中。巧的是，朱寿昌此时正在鄂州做太守，与黄州隔江相望，因而时常送去酒食。元丰三年(1080)四月，苏轼有一封写给朱寿昌的信，对他们之间的交往有较为详细的描述：

某启。武昌传到手教，继辱专使坠筒，感服并深。比日尊体佳胜。节物清和，江山秀美，府事整办，日有胜游，恨不得陪从耳。双壶珍贐，一洗旅愁，甚幸！甚幸！佳果收藏有法，可爱！可爱！拙疾，乍到不谙风土所致，今已复常矣。子由尚未到真，寸步千里也。未由展奉，尚冀以时自重。

……与可船旦夕到此，为之泫然，想公亦尔也。子由到此，须留他住五七日，恐知之。

朱寿昌专门派人送信送酒送水果给苏轼，苏轼也经常为朱寿昌写诗填词，写字作画。

在苏轼留下的文献中，可查到苏轼致朱寿昌的信有二十一封、诗八首、词二首、文二篇。其中《满江红·寄鄂州朱使君寿昌》一首，最为传诵：

江汉西来，高楼下、蒲萄深碧。犹自带、岷峨雪浪，锦江春色。君是南山遗爱守，我为剑外思归客。对此间、风物岂无情，殷勤说。

江表传，君休读；狂处士，真堪惜。空洲对鹦鹉，苇花萧瑟。不独笑书生争底事，曹公黄祖俱飘忽。愿使君、还赋谪仙诗，追黄鹤。

有人认为这首词是朱寿昌离开鄂州赴提举崇禧观时的送别之作，其实更可能是元丰四年(1081)的深秋，苏轼忽有感触，就填了这首《满江红》寄给对岸的朱寿昌。

长江、汉江的水自西向东奔流而下，在黄鹤楼上望去，浩渺的江水如葡萄般碧绿澄澈。这里也汇集着来自四川岷山和峨眉山融化的雪水浪花，以及锦江春色。朱寿昌当年曾是在陕州留有爱民美誉的通判，而苏轼是思乡未归的游子。面对这里的景色，苏轼很想对朱寿昌说说自己的心里话——“你千万不要去读《江表传》，像祢衡那样的狂士，虽然值得同情，但更多的还是让人深感痛惜。书生何苦与这种人纠缠呢？就算是操纵生杀大权的曹操、黄祖，不也是匆匆过客吗？还是像李白一样潜心作诗，赶追崔颢的名作《黄鹤楼》诗吧。”

巢谷

巢谷，字元修，是苏轼的同乡，苏轼在《巢谷传》中说，他们从小就认识。但苏轼兄弟二人在朝廷当官还算顺遂的时候，巢谷一次也没有出现在他们的视线中。

苏轼被贬黄州，巢谷出现了，虽然他来的时候已经是元丰六年(1083)。巢谷成了陪在苏东坡身边

好友相伴，他把黄州的岁月过成诗



被贬黄州，既是苏轼仕途的重大挫折，也成为他人生境界提升的起点。黄州之后，苏轼虽曾短暂重返权力中心，但余下的大部分时光都在贬谪中度过。在这些远离庙堂的日子里，他结识了许多名不见经传的“小人物”，如朱寿昌、王齐愈等。正是这些普通人在具体的生活小事中给予他实实在在的温暖，成为他人生中的“贵人”。作者刘墨的新书《如轼：苏东坡的后半生》以黄州为节点，聚焦苏东坡被贬后与众多“小人物”之间的温情交往，展现了他身上深厚的人文精神与隽永的生活趣味。

的好友之一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，他还成了苏迈、苏过两个孩子的家庭教师。

《大寒步至东坡赠巢三》诗中，苏东坡描述了二人的友谊，二人相互勉励，不抱怨，你我都是上天的子民，依然可以共享无边的春色。

如果说苏东坡是美食家，巢谷同样也是烹调高手。除了和苏东坡在一起共同回忆家乡“元修菜”的味道之外，巢谷还经常在雪堂中下厨烧菜。巢谷的到来，给苏东坡的生活带来了浓浓的情谊。苏东坡在写给堂兄苏不危(子安)的信中，就非常满意于他这一时期的生活状态：

近于城中得荒地十数亩，躬耕其中。作草屋数间，谓之东坡雪堂。种蔬接果，聊以忘老。有一大曲寄呈，为一笑。为书角大，远路，恐被拆，更不作四小哥、二哥及诸亲知书，各为致下恩。巢三见在东坡安下，依旧似虎，风节愈坚。师授某两小儿极严。常亲自煮猪头，灌血腊，作姜豉菜羹，宛有太安滋味。此书到日，相次，岁猪鸣矣。老兄嫂团坐火炉头，环列儿女，坟墓咫尺，亲眷满目，便是人间第一等好事，更何所羨。可转此纸呈子明也。近购获先伯父亲写《谢蒋希鲁及第启》一通，躬亲裸背题跋，寄与念二，令寄还二哥。因书问取。

在信中，苏东坡对堂兄能够在老家与家人围着炉火团聚在一起过年，先人的坟墓也在家附近

都跑了以避火灾，火都烧到了房檐，不过，你的两个瓢都好好的呢……

后来，当苏东坡被贬到海南儋州，苏辙被贬到雷州，后又派到循州，巢谷还去看他们，只是他没有见到苏东坡，就死在了路上。

李常

李常，字公择，南康建昌(今江西九江永修)人，比苏轼大九岁。

李常在年轻的时候，曾经读书于庐山白石僧舍，考中进士后，调江州判官，他将自己抄的九千卷书留在了庐山，名为“李氏山房”。熙宁三年(1070)，王安石为推行新法，任李常做权三司制置条例司，却被反对新法的李常拒绝，而且还和右正言孙觉、御史中丞吕公著、张戢、程颢等人一道上疏，明确表示反对王安石及其新法。为此，李常被贬通判滑州。

熙宁七年(1074)九月，李常调湖州太守。在那里，他开心地筑“六客堂”，以与张先、刘述、杨绘、苏轼、陈舜俞等人相会，他们的诗词被集为“六客诗”“六客堂词”。

熙宁九年(1076)，李常转齐州太守，苏轼的弟弟苏辙在他手下任事一年左右。苏辙非常敬重李常，赠诗歌几十篇。

苏轼与李常交往甚多，其起始时间，至迟应在熙宁五年(1072)苏轼任杭州通判时。

“乌台诗案”结束，苏轼被贬到黄州的四年多时间里，他主动与许多亲朋好友中断了联系，对方不再与他联系的也不在少数。宋朝为防止官员之间互相联结，对官员间交往的管理十分严格，除非出差，否则只能是调职途中“偶遇”。

李常此时是淮南西路提点刑狱，办公地点在舒州(今安徽安庆)，黄州属该路管辖。在苏轼到黄州九个月后，李常终于逮到一个出差的机会来看苏轼。元丰三年(1080)十月，李常从光州来到黄州看望苏轼。显然，对困顿中的苏轼而言，这一患难见真情的安慰力量是无比巨大的。为此，苏轼还在写给秦观的信中特意提了一笔：“公择近过此，相聚数日，说太虚不离口。”相聚数日后，苏轼陪李常过江浏览武昌西山寒溪等处的名胜，并作《菩萨泉铭并序》一文。李常用菩萨泉的来历安慰落难中的好朋友，既然人世间的万物皆有因缘，那一切就随缘好了，想多了也没用！

元丰四年(1081)，谪居黄州的苏轼又想起当年在湖州与李常等友人的聚会游玩。《书游垂虹亭》一文除叙述在湖州与李常、张先等人同游松江垂虹亭饮酒赋词的欢快场面之外，他还感慨地写道：

今七年耳，子野、孝叔、令举皆为异物，而松江桥亭，今岁七月九日，海风驾潮，平地丈余，荡尽无复子遗矣。追思曩时，真一梦也。元丰四年十月二十日，黄州临泉亭夜坐书。

试想此时此景，寂寞的苏轼冬夜独坐于黄州临泉亭上，念及昔日高朋云集，诗酒谈笑，对照眼下，自己的处境如此凄寒，三位友人已亡故，转瞬七年，恍若隔世，不禁千头万绪涌上心头，他觉得所发生的一切，真如人间一梦。

元丰五年(1082)，苏轼在东坡修造雪堂的过程中，还曾向李常索要橘树。后来苏轼将它写进了《东坡八首》之六中：

种枣期可剥，种松期可斫。事在十年外，吾计亦已逸。十年何足道，千载如风雷。旧闻李衡奴，此策疑可学。我有同舍郎，官居在瀟岳。遗我三寸甘，照座光卓卓。百裁倘可致，当及春冰渥。想见竹篱间，青黄垂屋角。

诗中同舍郎即指李公择也。想必，弄一百棵黄柑树苗栽在东坡之上，对李常来说并不是一件难事。

如果说到黄州之后的苏轼之所以不再主动与亲友联系，是因为怕别人受到自己的牵连，那么他与李常的关系却很是微妙，甚至让人颇为费解——在其保存下来的十七封书信中，约有十封为黄州时所作，占去总数大半。

《苏轼文集》卷五十一《与李公择十七首》从第八首开始是写于黄州，但这已经是元丰六年(1083)的春天了。这一年，苏轼病了一场，除了固有的眼疾之外，肺部也出了不小的问题，他只好猫在家中养病，不承想竟被人传为死去，连皇帝也被惊动。苏轼遂写信给李常，较为详尽地说明了前后原因。

也许是因为太久没有音信了，李常在来信中向他索要诗、词、画之类，并且将自己的“文编”寄给苏轼。对李常的索要，苏轼竟然几乎全部“拒绝”，这样的情况实甚为少有。

再看另外一封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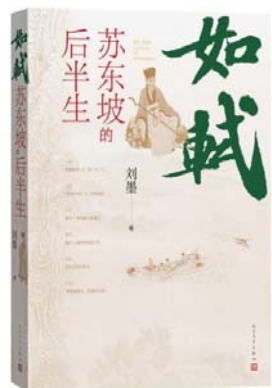
某启。示及新诗，皆有远别惘然之意，虽兄之爱我厚，然仆本以铁心石肠待公，何乃尔耶？吾侪虽老且穷，而道理贯心肝，忠义填骨髓，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，若见仆困穷便相矜，则与不学道者大相远矣。兄造道深，中必不尔，出于相好之笃而已。然朋友之义，专务规谏，辄以狂言广兄之意尔。兄虽怀坎于时，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，便忘躯为之，祸福得丧，付与造物。非兄，仆岂发此！看论，便火之，不知者以为诟病也。

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，苏轼是有意在回避与李常之间的亲密关系，“铁心石肠”。他又反过来规劝朋友，凡是有利于朝廷、百姓的事情，尽管去做，不必考虑得失进退，即使是穷困与死生，也应该坦然面对。

元丰七年(1084)三月，苏东坡被授予汝州团练副使，本州安置，不得签书公事，这意味着，四年多的黄州生活结束了。

离开黄州，他首先前往庐山，在那里找到了李常的藏书山房，写下《书李公择白石山房》一诗：“偶寻流水上崔嵬，五老苍颜一笑开。若见谪仙烦寄语，匡山头白早归来。”

(本文摘自《如轼：苏东坡的后半生》，内容有删节，标题为编者所加)



《如轼：苏东坡的后半生》刘墨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